

中国触动

百国视野下的观察与思考

一个只会使用别人话语的民族在世界上是没有分量的，中国人要用自己的话语来解读中国和世界，中国崛起的过程也必然是一个中国话语崛起的过程。

《中国触动全球》修订版

张维为◎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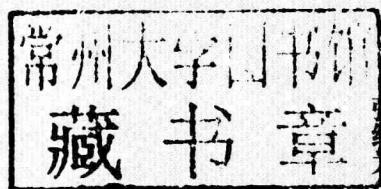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中国触动

百国视野下的观察与思考

张维为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触动：百国视野下的观察与思考 / 张维为著.
—修订本.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ISBN 978-7-208-10455-6

I. ① 中… II. ① 张… III. ① 政治—研究—中国—现代
② 中国经济—研究—现代 IV. ① D6 ② F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53487 号

责任编辑 袁晓琳 蔡 欣
装帧设计 水玉银文化



中国触动：百国视野下的观察与思考

张维为 著

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出 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100027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 8 号林达大厦 A 座 4A)

发 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 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 × 1020 毫米 1/16

印 张 16.5

插 页 8

字 数 170,000

版 次 2012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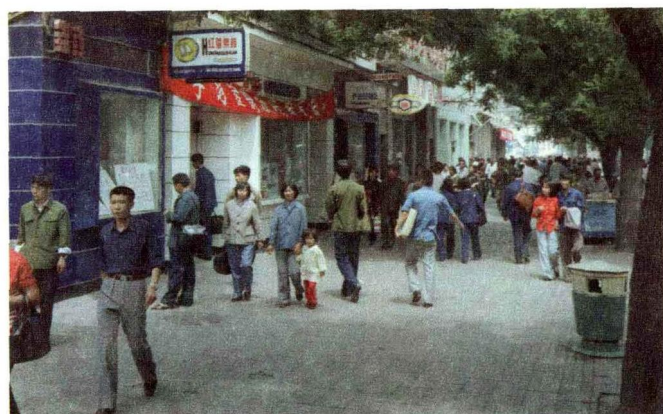
ISBN 978-7-208-10455-6/D.2022

定 价 36.00 元

1983年4月15日上午9点30分，我由北京首都机场搭乘中国民航973号班机经广州飞往泰国，这是我第一次出国。23年后的2006年7月17日清晨8点50分，我乘乌克兰航空公司218号班机由索菲亚起飞，经贝尔格莱德飞往乌克兰，走进了我的第100个国家。如果加上曾去过的香港、澳门、台湾等特殊地区，那么迄今为止，我已走访了106个国家和地区……



1983 年曼谷商业区 (新华社图片)



1983 年 北京王府井 (新华社图片)

今天访问泰国曼谷归来的很多国人，谈起曼谷都不屑一顾，无非是一个热热闹闹而又乱糟糟的城市。但我从 1983 年 4 月 15 日抵达曼谷国际机场的那一刹那起，就不时感到“震惊”。在这个地方，我第一次看到了汽车飞驰的高速公路。第一次看到了晚上 9 点还在营业的超级商场，各种商品应有尽有，主要街道到了晚上 10 点钟还是车水马龙，热闹非凡。

从泰国回来不久，我就到外交部翻译室报到。我参加的第一场重要外事活动是接待菲律宾马科斯总统的夫人伊梅尔达·马科斯。马科斯夫人先派了一个先遣组来北京为她的访问做准备。因为马夫人是世界闻名的采购高手，所以她的先遣组成员个个都是采购高手。他们干脆开玩笑，称自己是 advance shopping group (先遣采购组)。他们老是打听北京哪里购物最好，礼宾司总是推荐北京友谊商店，这是当时北京为数不多的涉外商店，所以菲律宾先遣队很快有了个口头禅，“Friendship Store again? (怎么又是友谊商店?)”“北京除了友谊商店还有其他商店吗?”他们好几次问我。

时间飞逝。30 多年过去了。今天我可以这样说，在现代化的进程上，中国已经大步地走在泰国、菲律宾这样的国家之前了。我后来访问泰国不下 10 次，泰国和中国的差距逐步显现，曼谷和上海、北京的差距也明显拉大。



与法国前总理法比尤斯合影

实际上，不管你是否使用“中国崛起”这四个字，国际社会似乎已普遍接受了这个概念。置身国外时，对此感受尤深。中国的崛起似乎是一个无处不在的事实。当然，对于中国的崛起，除了赞誉之外，也有不少担心、疑虑甚至反感。我去意大利米兰做访问教授，一位当地学者私下对我说：“很多意大利人害怕中国人：中国人来了，把经营不下去的杂货店和餐馆都买下，然后开意大利餐馆，卖比萨饼和面点，比我们意大利人做得还好，还便宜，再加上偷税漏税，我们怎么竞争？”意大利和西班牙后来都出现过针对华人的骚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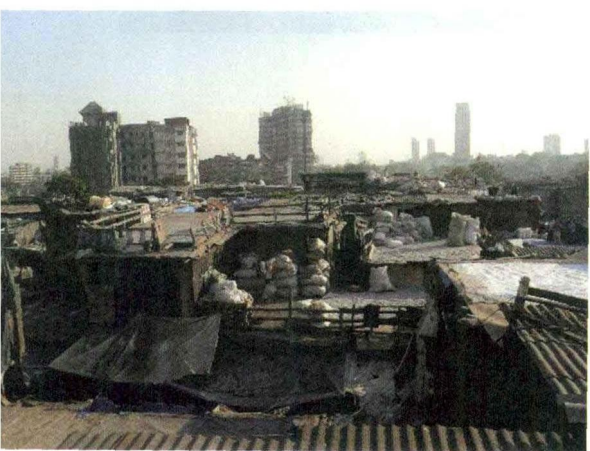
有一次我去巴塞罗那开一个讨论中欧关系的学术会议，见到法国前总理法比尤斯，他对我说：“我们欧洲人心里真是有点害怕中国，不是担心你们要打仗，而是担心这么一个问题：除了需要人与人直接接触的服务外，在几乎所有其他的领域，中国最终都可能成为我们的竞争对手。”



横穿孟买城区



孟买的“南京路”



印度城市的特点：陋宅包围高楼

谈中国崛起，有国际比较才有说服力。国际比较中最有意义的大概就是中国和印度的比较，因为中印两国都是人口大国，起点比较相近。中国有 13 亿人口，印度是 12 亿人口。两个国家过去几十年走了不同的政治道路，半个多世纪过去，中印两国差别巨大。中国的粮食产量是印度的 2 倍，中国的经济规模、外贸总额、原油产量、发电量等大约是印度的 4 倍。中国的外汇储备、钢产量、电视机数量等大约是印度的 6 倍，而艾滋病人数低印度 6 倍。中国吸引外资额大约是印度的 10 倍，中国的人均寿命也高印度 10 岁。在高铁、高速公路、奥运会奖牌总数、妇女地位、贫民窟状况等方面，中国的情况比印度不知好多少倍。

如果你去印度实地访问，你可能会感觉这个差距更大。你可以驾车从北京或上海市中心出发，往任何方向开 20 个小时，你把你一路所看到的贫困现象加在一起，会少于你从印度的孟买、新德里、加尔各答市中心往城外开 2 个小时所看到的贫困。



和印度杰恩教授在欧洲政策中心

2008年1月我去布鲁塞尔参加一个由欧洲政策中心举办的中印崛起研讨会。我和来自印度尼赫鲁大学的杰恩教授分别介绍了中国和印度的崛起及其对欧洲的影响。杰恩教授承认欧盟和中国的战略对话已经有相当的深度，印度还不到这个水平，他说：“印度还没有到中国的水平，中国是奥运会级别的，印度只是英联邦运动会级别的。”该中心的创始人克劳斯克教授是一位资深的学者，他让我比较中印两国的政治制度，我说：“民主制度是一种手段，它最终要落实到国家的治理水平。迄今为止，中国的国家治理水平要好于印度。”

我对印度的杰恩教授说，从我自己的研究来看，还没有发现一个发展中国家能通过一人一票而实现现代化的，但我倒是希望印度能走出一条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从而能为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带来希望。近年印度在不少方面也取得了一些突出的成绩，特别是软件业、制药业等，其中不少独特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但总体上看，由于没有一个致力于现代化的强势政府，印度未能克服一些制约现代化建设的根本问题，如种姓制度、妇女解放、土地改革、文盲和赤贫等。



铁托的签名

中国崛起要顺利，要精彩，就要学习别人的长处，汲取别人的教训。就我自己的经历而言，对南斯拉夫解体前后的实地观察是我难以忘怀的经历。

1986年7月，我以英文译员的身份随总理访问南斯拉夫。1986年的南斯拉夫已经非常开放，欢迎我们的宴会在一个名为“三顶草帽”的酒吧餐馆举行。歌手唱了许多爱国歌曲，其中一首叫《南斯拉夫颂》，坐在我边上的南外交部的一位官员告诉我，1980年铁托逝世后的那些日子，无论你走到哪里，人们都唱这首歌，广播电台也不停地播放这首歌，“我们一定要团结，这是铁托生前的嘱托”。

塞尔维亚驻日内瓦联合国机构大使沃克维奇曾对我说：“现在回想起来，铁托在世时，大家对南斯拉夫的认同还是很强的。如果铁托能够多活几年，也许我们就可以完成与欧共体的谈判，使整个南斯拉夫作为一个整体加入欧盟，这样后面的国家解体和战争，大概都可以避免了。当然，现在一切都已无法挽回了。”

20年后，我又踏上了旧地重游的征途。我把行李放在旅馆，叫了辆计程车赶往那家令我难忘的“三顶草帽”酒吧餐馆。我碰到了饭店的老板，一说起20年前的事，他说：“我知道，我知道，那是我父亲时候的事。”于是他进入里屋，从一个红色的大柜子里拿出了三本厚厚的贵宾签名册，帮我找到了当年美国总统老布什和铁托的签字。指着铁托的笔迹，他感叹：“老头子来这里吃过好几次饭，他是我们最怀念的人。老头子死了以后，我们的国家就每况愈下。”他说：“从整个70年代到80年代初，那是我们最好的日子。”他不无遗憾地说：“铁托是政治家。一人一票选不出铁托，却选出了米洛舍维奇，最后国家都垮在这些政客的手里了。”他还愤愤不平地说：“你看，现在科索沃又要独立了。”我可以理解他的感情，只要想一想这20年塞尔维亚人所经历过的大灾大难。但他最后还是笑着对我说：“经历过战争的人都喜欢一句话：‘不管怎样，我还活着。’活着就应该感到幸福。”他举起手里的杯子，和我一起把那苦涩的塞尔维亚啤酒干完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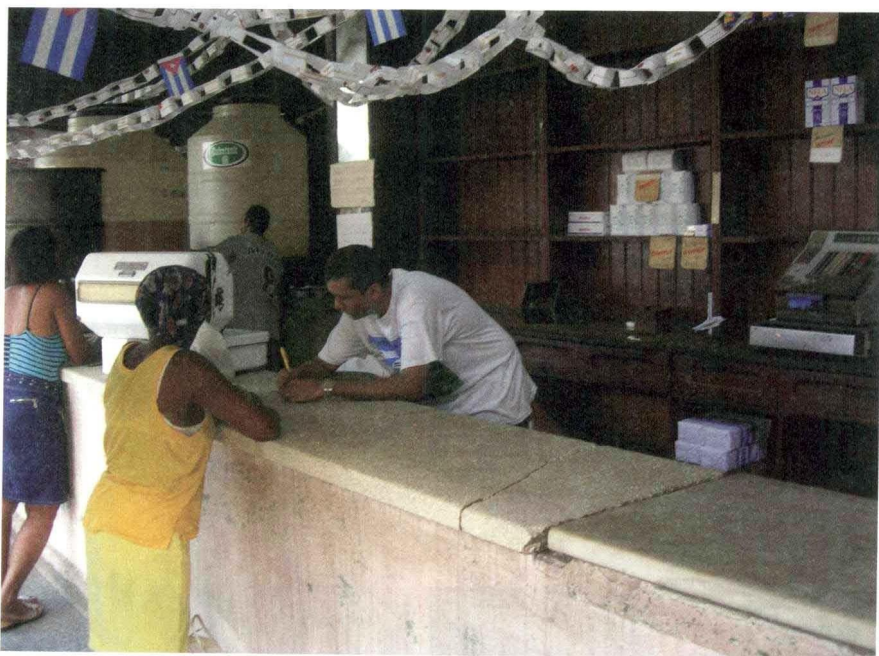
科索沃当年的“民族团结纪念碑”

在科索沃首府普利什蒂纳，我和科索沃电视台的总经理 A 君谈天，他自己在贝尔格莱德念的大学，“我当时最好的朋友都是塞尔维亚人，”他对我说，“但是后来米洛舍维奇搞大塞尔维亚主义，我和我夫人是阿族，我们就失业了。这种迫害甚至涉及了孩子，塞族孩子和阿族孩子天天打架，最后只好分开，上不同的学校，等于是种族隔离。”我们一起散步到市中心，看到了穆斯林的清真寺、东正教和天主教的教堂，A 君说，你看，不同宗教完全可以和平相处。不远处还有一个纪念碑，由三根高高的柱子组成。他告诉我：“这是纪念铁托生前最后一次访问科索沃而矗立的，象征了阿族、塞族和其他民族的团结，当时，科索沃省是南斯拉夫不同民族、不同宗教和睦相处的模范省。”

一个国家的发展，就像人的一生，主要就是关键的几步。这几步走对了，一切都会比较顺利，前景会比较光明。这几步走错了，就会伤筋动骨，甚至全盘皆输。回头看一下中国走过的30年，不能说没有犯错误，有些错误也不能说不严重，但是在最关键的几步上，我们走对了。改革开放从1978年底开始，回头看来，如果不是邓小平这位强势领导人的主张和坚持，中国本来也可能选择不同的路径。比如选择“极右模式”，走一条全盘西化，用一个亲西方的政府取而代之的西化模式。关于西方模式在发展中国家的实效如何，我可以简单谈一谈菲律宾的情况。因为没有一个国家在西化比那里更彻底了。我是2005年夏天访问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的，首先入目的就是大量的贫民窟。菲律宾全国30%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平均每日的收入不到一美元。现在每十个菲律宾人中就有一个背井离乡，在海外打工，总计约800万人，使菲佣成为菲律宾整个国家的名片。菲佣的汇款也成了菲律宾外汇收入的主要来源。菲律宾的机场都设有为劳务输出人员开辟的专门通道。



香港中环，每到周末菲佣的休息日，她们会在这里休息聚会



古巴哈瓦那的副食品商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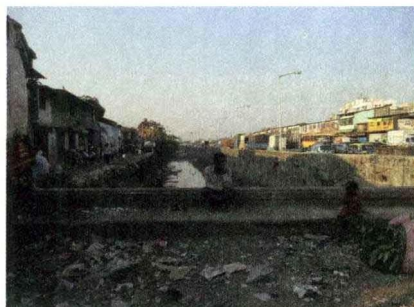
又比如，古巴的“保守改革模式”。古巴的改革模式可以称之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尽量坚持原来的体制，在局部地方作一些小打小闹的改革。古巴坚持计划经济，但也增加了有限的市场调节，和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很有影响的“鸟笼经济”思路颇有共通之处。2005年8月，我到古巴访问了10天，住在一个朋友家中，所见所闻，感触颇多。古巴给人的印象是令人失望的。如果用两句话来总结，那就是：古巴的经济太困难了，人民的生活太艰苦了。我对自己说，如果中国当时没有能够勇敢地走向市场经济，接受全球化的挑战，中国今天的状况可能不会比古巴好多少。哈瓦那主要商业街上的商店大都空空如也，服装店的橱窗就是几件白衬衫，药房出售的，包括红药水、紫药水在内，大概只有二三十种药。市场供应给人的感觉比北京、上海在“文革”期间还要萧条很多。我的房东告诉我，主要生活用品都实行配给供应。面粉、猪肉、鸡蛋，甚至食用糖，都凭证供应。牛肉是国家专营，私人买不到，只供应给涉外的饭店和餐馆。

我去过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如印度的孟买、新德里、加尔各答，去过巴基斯坦的卡拉奇、拉瓦尔品第，去过菲律宾的马尼拉，去过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圣保罗，去过墨西哥的墨西哥城，去过肯尼亚的内罗毕，去过南非的约翰内斯堡，去过科特迪瓦的阿比让，去过尼日利亚的拉各斯，去过马达加斯加的塔那那利佛。在这些地方的实地观察告诉我：这些国家城市中的贫民窟规模超过中国3倍、5倍、10倍甚至更多。我们的大城市贫富差距也不小，也有城中城和城乡结合部的陋宅等，但那不是发展中国家贫民窟的概念。发展中国家的贫民窟指的是一种成片的甚至一望无际的，非常拥挤、肮脏、人居条件极端恶劣的简陋窝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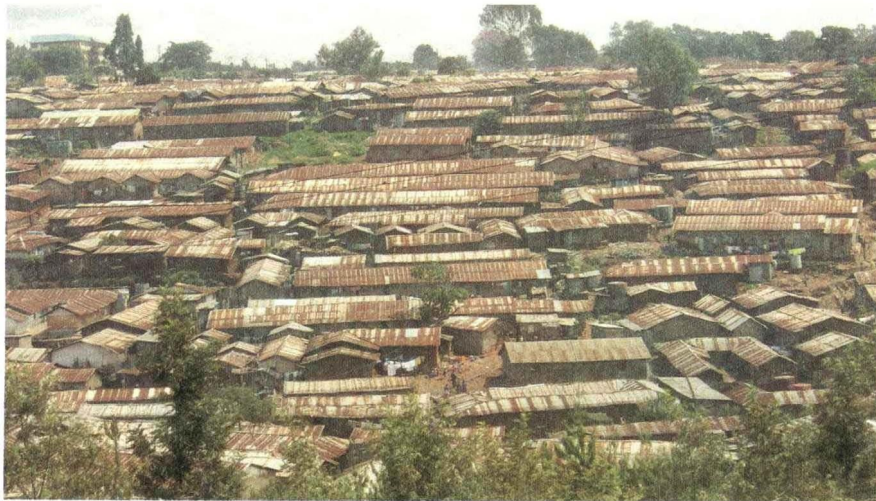
以印度的最大城市孟买为例，60%的城市人口至今仍住在贫民窟。那种恶劣的居住条件是我们难以想像的……我也看过非洲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一个叫做基贝拉(Kibera)的贫民窟。内罗毕50%的人口住在贫民窟。司机只带我在贫民窟外面转了一圈，解释说：“除非两辆警车开道，否则你给我1000美金我也不进去，因为进去就出不来了。里面的人肯定把我的车和钱都抢走，命也保不住。”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曾在重兵保护下去这个贫民窟访贫问苦，当地的居民打着标语欢迎他：“我们在挨饿！”“我们在生病！”“我们正在死去！”“我们的孩子没学上！”光这个贫民区的人口就有75万，没有电，没有自来水，只有50%的家庭拥有收音机，艾滋病发病率高于城市其他地方三倍。



印度贫民窟(之一)



印度贫民窟(之二)



肯尼亚内罗毕基贝拉贫民窟



加纳首都阿克拉的“王府井”



加纳首都阿克拉市中心

西方民主模式在发展中国家鲜有成功的例子，中国的政治改革一定要走自己的路。如果西方真心诚意要在发展中国家推动民主，就应该认真总结自己民主发展的历史，其中一个关键问题就是民主化的顺序。西方原生态的民主社会演变的顺序大致可以这样概括：一是经济和教育的发展，二是市民文化和法治社会的建设，最后才是民主化。这个顺序搞错了，一个社会要付出沉重的代价。

西方关心的只是表面的形式民主，认为形式本身就会产生正义，但正如肯尼亚出生的英国记者艾丹·哈特利对一些非洲国家的选举发表的坦率评论：“选票无非是给那些贪官污吏一件合法的外衣，使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掠夺百姓5年，这个周期一结束，下一个同样的周期又开始了。”

非洲许多国家的社会结构还是传统部落和宗法社会。非洲不少国家的政治往往是一种零和游戏，赢者得到一切，输者失去一切。选举的结果又几乎完全是按照部落和宗教区分的，同一个部落的人，永远选自己部落的人，同一宗教的人永远选自己宗教的人，结果是选举一次，人民的分歧加剧一次，直到格斗、动乱、内战。据我的观察，在非洲这么多穷国中，大概只有坦桑尼亚和加纳等为数不多的国家基本走出了部落主义的怪圈，但即使这样，坦桑尼亚和加纳的经济发展仍然落后，光是看它们相对繁华的城市，如阿鲁沙和阿克拉，给人感觉也像是30年前的中国县城。



战火中的黎巴嫩（新华社图片）

西方公民社会理论强调对立和对抗，这在族群比较单一、法制比较健全、教育普及、中产阶级壮大的国家，不会造成太大的问题，但是在那些不具备这些条件的发展中国家，这种对抗容易带来社会分裂和冲突。我1994年曾访问过黎巴嫩，当时整个黎巴嫩已经摆脱了长达15年的内战，一派百废待兴的景像。从我在实地了解的情况来看，黎巴嫩的公民社会在内战之前、之中和之后，都是相当活跃的。但是这种公民社会是完全分裂的，分别附属于不同宗教、不同派别，如马龙教派、德鲁兹教派、逊尼派、什叶派、长枪党等，更像是中国“文革”时期的各种闹派性的组织，它们实际上加剧了黎巴嫩的分裂和冲突。

我在黎巴嫩驻埃及的领事馆办签证时，看到领事馆的墙上挂了一张画有和平鸽的宣传画，上面写着：“黎巴嫩：死去1000次，再1001次复生。”我到黎巴嫩实地一看，这个曾被称为“中东巴黎”的城市里，到处都可以看到战争的痕迹，整个市中心，包括希尔顿饭店、假日酒店等都只剩下残垣断壁了。这场内战使这个当时人口才300多万的国家失去了14万生命。我的导游是个60岁的亲历者，他对我说：“战争已经过去几年了，但黎巴嫩人的薪水还在一路走低，谁都想离开这个国家，如果我有女儿，一定让她嫁给你。”

尼日利亚也是一个公民社会颇为发达的国家。但我去过它最大的城市拉各斯，那里白天治安都非常差，晚上更是危险。我的感觉是，你能白天在拉各斯市中心大街上太太平平地散步半个小时，就是一种奢侈。尼日利亚有那么多促进人权的非政府组织和政府组织，但究竟保护了多少人权？非政府组织越多，社会管理得越好，民主就越成功，这个观点至少在发展中国家还不能成立。



贫困与民主：拉各斯街景

序 言

《中国触动全球》是我走访百国后写的第一本书，于2008年出版，读者的积极反应鼓舞了我，促使我写了走访百国后的第二本书《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于2011年出版，读者的反响非常热烈。这两本书可以说是一对姐妹，前者讲的是中国触动，后者讲的是中国震撼；前者更感性一些，后者更理性一点；前者是后者的铺垫，后者是前者的升华，但一条主线贯穿其中：中国人要用自己的话语来解读中国和世界。

我很高兴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同意以《中国触动》的名字来出版《中国触动全球》的修订版，使这本脱销已久的书得以再生。《中国触动》的名字更加言简意赅，某种意义上也更加符合我写作此书的本意之一，即触动更多的国人以一种全新的国际视野来看待自己国家的崛起、问题和前景。

我把全书又看了一遍，书中的主要论点没有改动，我想它们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但书的结构作了一些调整，从原来的七章变成了现在的六章，我把原来专门谈国际比较的“环球同此凉热”一章拆开，分别融入了现在的第一章和第四章，从而更加突出这些章节里国际比较的内容。修订版还在不少地方充实了新的内容，如在“与世界比较，

中国打几分”一节中，增加了治安问题的国际比较；在讨论软实力的最后一章中，增加了关于中国模式的内容。此外，还更新了一些数字，纠正了一些笔误，增加了更多的图片。

我在本书原版的《后记》中曾说过：“一本书一旦出版，便获得了自己的生命，读者或褒或贬，均不在作者的掌控之中，但我也以为自己写作此书的意愿，即用中国话语来论述中国和世界只会随着中国的崛起，而越来越有生命力。”这还是我今天的观点，真是希望更多的中国人一起加入中国话语崛起的潮流，客观自信地评述自己的国家和外部的世界，不必跟在西方话语后面亦步亦趋，那是没有出息的。

谨借此机会诚挚地感谢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陈昕总裁和施宏俊副总裁以及文景公司的蔡欣和袁晓琳编辑，感谢他们为此书修订版的出版所做的许多工作。我也再次感谢许多学者和朋友的不断鼓励和帮助，特别是李君如、李世默、金仲伟、史正富、陈平、黄仁伟、姜义华、张文木、王文、萧思建、罗伯特·库恩等。在本书原版的《后记》中我还感谢了许多人。

不久前，哈佛大学教授尼尔·弗格森在一篇文章中追述自己如何产生了“世界向东方倾斜”的命题。他追忆到：可能是在2005年首次于上海外滩散步的时候，可能是后来在重庆听当地干部描绘未来中国西部金融中心的时候，也可能是在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上。他从中国这三个地方的巨变中悟出了一个大命题：世界正在见证“西方500年支配地位的终结”。在此书修订的二个月内，我正好也有机会在这三个城市逗留，再加上自己过去走访百国的经历，我得出的结论和弗格森教授是一样的：世界在向东方倾斜，在向中国倾